

石 印 脛 说

苏 晓 君

在石印技术引进中国之前,雕刻木板是主要的制版方法,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它已延续了上千年。版材由木质到石质的变化,是印刷术发展的一个飞跃。“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①。石印平版印刷的出现,标志着印刷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与铅字印刷一起,形成了两股新的力量,逐渐代替了古老的雕版印刷,尽管在印刷史上它犹如昙花一现,但仍使得中国印刷业在近现代,展现出绚丽的风采。

石印术是德国人施内费尔德于1796年发明的,从这之后的一两年内开始用于印刷文件、乐谱、图画。算来,至今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将石印与传统雕版相比较,其优点在于工艺简单,省去了雕凿之工;制版便捷,印刷速度大大提高;修改方便,降低了印刷成本;版材经济,且可反复使用。据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的《印刷局问答》记载,当时在日本,石板三十面用金二百五十元,那么一面石板也只需八余元。到后来石印发展到具有复制功能的影印技术,更是以往任何印刷术所不能替代的,这使其成为中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思想、文化及艺术作品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

石板印刷采用的是多微孔的天然石,主要利用了油水相拒的原理,印刷时,先用水润湿石面,使无墨处吸水后有拒油性,这样上墨后,仅图文部分能附着油墨,然后覆纸刷印。用石材制版印刷大致

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将脂肪性油墨直接上石，绘制图文。这虽然方便，但需要在石板上反书，才能印出正向符号，具有一定难度，所以使用率不高。第二种，先将原稿书写在特别的药纸上，再将药纸覆于石面，强力下压，使得纸上的胶性药墨附着在石面上，遂成初版。近代藏书家杨守敬在《欧游随笔》中细致地描述过这种方法：“德国印书石一物，以化学作成之。油书于纸上，拓于石面，字迹结而不散，可任意用油墨刷印，每刷一次润水一次。”他的《英轺日记》中也提到了英国的石印方法：“英都石印机器，由黄腊石为之，印字以石刷墨以机轴铺以纸，石过轴转则字现。有字处着墨之，无字处不着，石平并无凹凸。”这种方法解决了反书上石的困难，制版方便随意，被广泛采用。第三种称为照相石印法，是法国人A.勒梅尔西埃1852年发明的，即将待印图书逐页摄影，然后把底片晒印在黄色的胶纸上，之后再将胶纸上石。清光绪二十二年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强学会被查禁后，转而成为翻译出版机构——官书局，时任强学会总董的张孝谦也转为官书局主持，在他主持局务后，曾经专门考察过日本的印刷业，与日本当时任印刷局长的得能通昌有过一次长谈，内容被记录在前述《印刷局问答》中。在被问及有关照相版的应用问题时，得能通昌是这么说的：“照相版即由照相而成之原版。凡纸币印花、公债、证书等，必先由照像转于石版，又由石版转于铜版，始能印刷。惟书籍杂志中之风景人物，即用此照相原版印刷，最为便利。”这里他提到了照相制版的程序，虽然工艺已比较复杂，但影印的原理是一致的。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中把整个制作过程说得比较具体：“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剗斲氏二子，可不烦磨砺以须矣。”照相制版方法，同第一第二种手工描绘制版比较，不但提高了制版速度，而且能准确反映底本原貌。对此，杨守敬在《使英日记》中发出过这样的赞叹：“英国印字之巧，能取中国字迹照印上版，而刷印能毫忽无差。”由于

石印的这种特殊功能,所以又通称为影印。这种方法的应用,使得中国很多善本、孤本图书得以面世。如光绪十八至二十年(1892—1894)同文书局为清廷影印的殿本《古今图书集成》,民国八年(1919)张元济编辑的《四部丛刊》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至十五年(1924—1926)影印的《正统道藏》等等,都充分展现出影印技术的使用价值。

石印术在被引入到中国后,除影印书外,书籍的版本形式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依然保留了当时人们已经习惯的雕版版式,有边栏、行款、鱼尾、书口,装订仍然大多采用传统的线装,其中有些刻意模仿雕版式样的石印书,确实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字体则略有不同,不再是流行的长方形宋体,而多为手工书写的楷书。到了上个世纪初,大量出版的通俗类普及性读物的石印本,则行距更密,行字更多,开本也比较小,纸质一般也不很讲究,多为经济的连史纸,这些无疑满足了降低成本扩大销路的需要。这一类书籍虽然市场效益很高,但却没有了以往展卷后从版式上得到的美感。

系统地记录石印技术发展过程的专著是不多的,但从现有的一些零星资料中,了解到石印术引进到中国后,初期发展的主要事项。综合各方面记载,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屈亚昂从英国人马礼逊之子马儒翰那里学会了石印术,成为第一个掌握此项技术的中国工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是近代最早来华传教者之一,对中国近代印刷业,曾起过比较大的作用。他于道光间在广州用中文石印出版了《各国消息》,其中道光十八年九月和十月两册,是现存最早的中文石印品,藏品现存伦敦(这是瞿冕良先生作出的结论,比一般的说法提早了四十余年)。而麦都思于道光二十三年在上海所设立的墨海书馆,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商业经营性质的印刷所。中国最早大量采用石印术的出版机构,是英国商人美查于清光绪五年(1879)在上海创立的“点石斋石印书局”,他们首先以当时先进

的照相缩印技术，翻印木刻古籍，从现存的典籍看，有光绪五年影印的《御制耕织图》，扉页的牌记题“光绪五年春点石斋缩本”，这说明在当年的春季就已开工生产，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还有光绪六年影印的《泛槎图》、八年照相石印的《增刻红楼梦图咏》等通俗艺术品，以及它影印的殿版《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工具书，使得这个新工艺的采用，不但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给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出版业产生巨大震动。当时的畹香留梦室主感慨道：“英人所设点石斋独擅其利已四五年，近则宁人之拜石山房，粤人之同文书局，与之鼎足而立。甚矣！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也。”^②光绪八年由广东人徐鸿甫、徐润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同文书局，有五百名职工十二部石印机，采用摄影方法制版，以手摇石印机翻印善本古籍为主，在当时石印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之后又有拜石山房、中西五彩书局、鸿文书局、崇文书局、文明书局、上海书局、大成书局、宝文书局、大同书局、袖海山房、群玉山房、积山书屋、天津石印书屋、上海奎光阁、飞影阁、古香阁等等，在短短十来年内迅速建立起遍及全国的石印机构，连古老的“校书如扫落叶”的席氏扫叶山房也不甘居人后，在上海、汉口、松江设立分号，引进石印技术，出版了像《册府元龟》200册、《佩文韵府》200册、《太平御览》100册、《百子全书》80册等这样大部头的石印书籍。石印出版机构的纷纷建立和石印技术的普遍使用，表明石印出版在中国开始进入了发达成熟阶段。此外，点石斋于1884年5月8日在上海创刊的著名的旬刊《点石斋画报》，由吴友如主编，以社会新闻画和战事新闻为主，每期八幅，石印连史纸印刷，既开画报出版的先声，又以清新的画法及对新事物的及时报道，影响着当时的画风。至1896年停刊，共出版了四百七十三期，对近现代新闻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石印技术在百余年中，如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兴起、昌盛、衰落的发展过程。由纵向看，从清道光十二年到光绪八年为发

展初期,中国人开始逐渐接触、了解到西方这一先进印刷技术,但没有形成规模,也就是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磨合,才开始被大多数人认可。造成这个过程的根本原因,是与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及固有的保守思想直接相关。1882年同文书局的建立,标志着兴盛时期的开始。石板印刷机械的出现,带给石印技术新的生命,用蒸汽作为动力,曾创造过每分钟印制图书近七千张之多的记录;清光绪三十年上海文明书局最先采用了彩色石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如《旧石印画》所采用的手工覆彩着色法;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引进了先进的直接照相石印法,民国十年商务印书馆又最先采用美国人汉林根传入的彩色照相石印技术,这些技术上的改进,使得印刷周期缩短,质量日臻完善,步入了空前繁荣的新阶段。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的爆发,以涵芬楼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告结束。战争之后,胶印技术兴起,滚动的橡皮布,带来印刷业的又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石印逐渐衰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基本上已被淘汰,是为后期。石印版材笨重,质地较松软,承受压力有限,且易磨损;着墨前的润水上石,使纸张因吸水而变形,往往套印不准;而且基本上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强度大、效率不高等因素,阻碍了它的发展,被新技术所替代也是必然的。它的兴衰,记录下了印刷史上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虽然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石印品如今也大多成为了古籍,但其在文化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曾是那么巨大,这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由其演变而成的珂罗版技术,将版材由玻璃取代了石材,作为一种独特工艺至今仍在使用,或者可以看作为石印技术的余绪。

石印作为一种先进的印刷术,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在现有的藏品中可以看到,用途广泛专门提供检索查考的工具书,占有很大分量,特别是应时品种,曾被多次反复出版。如汇集子部、史部名言隽语的《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本,在光绪到民国年间,就达八种不同的石印版本:有上海点石斋清光绪九年(1883)石印本,同文书

局光绪十年、十二年石印本,上海积山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上海宝文书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石印本,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宣统元年(1909)石印本,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11年(1922)以及上海中华图书馆民国间石印本等。如《佩文韵府》,凡60册,点石斋在光绪间的六年中,就石印过三次,分别是光绪八年、十二年、十三年;而同文书局也在光绪十二年、十三年、十八年七年里石印过三次。再如《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本,点石斋于光绪九年、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出版过三次;在光绪十三、十八年,同文书局也出版过两次。这样短期内多次大批量的出版,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清光绪后期到民国初年,大量的通俗艺术、文学作品也多为石印本。像光绪八年点石斋石印的《增刻红楼梦图咏》,光绪十三—十四年鸿文书局石印的《芥子园画传》,光绪十三年大同书局《诵获斋曲二种》,光绪十九年上海飞影阁的《均天乐》二卷本,光绪二十年袖海山房《百宝箱》二卷本和奎光阁《后西厢记》四卷本,光绪二十七年上海书局的《西厢记》五卷本,民国三年群玉山房《红楼传奇》八卷本,民国六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的《桃花扇》等等。通俗的文学作品适合了文化层次较低人群的阅读,而廉价的石印本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使人求取如志,充分满足了人们的欣赏需求。

在版本著录上,习惯将石印、石板影印分开表示。石印书与影印书由于制版上共性很多,反映在印品上,使得两者不易区别,在鉴定版本方面造成异议,同一版本书,既有石印又有影印,这是矛盾的。石印和影印都属于平版印刷,版材都是石质,印刷程序与方法也基本相同。不同点主要在底版制作上,石印是重新创造一种版式,形成一种新的风格,影印则保留了底本的本来形态,属于对原本的再翻新,也就是说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复制功能。这一点把握住了,一般就不会走眼。如清人万斯同撰《历代史表》,上海古香阁光绪十九年出版,版式像通常的刻本,有行款、边栏、书口、鱼尾,字体为仿宋字,但平版特征比较明显,没有刷印后留下的

凹凸压痕，版面也很洁净，不是旧本的复制，由此断定为石印本，是恰当的。点石斋光绪五年出版的四十六幅《御制耕织图》，版式虽然小于康熙间的原刻本，若拿原本来比较点划线条，则彼此是不爽丝毫的，而牌记所题“光绪五年点石斋缩印”，也表明了它的影印特征，是缩小后的再现。传统上有一种观点，在石印与影印两者之间，以文字是否为手书做区分标准，认为凡手写体都是石印本。对于这一点不妨这样来理解，石印本的文字符号都是手工书写绘制的，但不能说手书体都是石印本，这里面的道理是毋庸置疑的，必须明确，手书的也有很多是复制的影印本。在石印本中，也常有模仿传统的刻本版式，像前面提到的《历代史表》，以及清末民初的通俗读本，字体大多是手书的楷体，是在保留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风格新版式，对于这种仿造还应该综合仔细地辨别。至于以书页是否带有油渍来鉴定，就显得过于简单了。

石印本是一种版本形式，石印术是一种特殊的印刷技术。石印本在版本形态中所占分量甚微，往往被一笔带过，或者不予涉及，但它是古籍中的一个实体，不应该被忽视。诚如史学家郑鹤声及教育家郑鹤春对它的评价“中国旧籍，亦资以广为传播，又进而有铜板玻璃板之类，影印书画，不下真迹，实为文化之利器焉”^③。石印技术，不仅仅在于它在印刷史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及其在百来年中所广泛表现出来的使用价值，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石印技术及石印书籍的了解与认识，可以更准确掌握它们不论是印刷或是版本发展方面的连续性和特殊性。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人的专利，而石印技术在近现代的普及与应用的事实，则是中国人反过来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求真务实的一个明证。

注：

①③《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书店，1983年。

②《淞南梦影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分馆